

六合叢談

◎ 附解題·索引

沈國威 編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六合叢談

◎ 附解題·索引

样-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沈國威 編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六合叢談:附解題·索引/沈國威編著.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6.12

ISBN 7-5326-1869-2

I. 六... II. 沈... III. 漢語—期刊—彙編—中國—1857~1858
IV. H1-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90704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責任編輯 王聖良 府之晨

裝幀設計 汪 溪

出版人 張曉敏

六合叢談

——附解題·索引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上海陝西北路 457 號 郵政編碼 200040)

聯繫電話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49.25 插頁 5 字數 1 066 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6-1869-2/K·332

定價: 198.00 圓

如發生印刷、裝訂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聯繫電話:021—66511611

沈國威

日本關西大學外國教育研究機構

教授

出版人 張曉敏
責任編輯 王聖良
裝幀設計 汪溪
府之晨

研 究 編

解題——作為近代東西(歐、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史料的《六合叢談》

《六合叢談》中的地理學術語

從“黑茶”到“紅茶”——《六合叢談》中所見之“紅茶”

譯詞“化學”的誕生——從《六合叢談》看近代中日詞彙交流

在自然神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六合叢談》的科學傳道

《六合叢談》所介紹的西方科學知識及其在清末的影響

《六合叢談》的編纂及其詞彙

目 錄

研究編

解題——作為近代東西(歐、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史料的《六合叢談》	1
《六合叢談》中的地理學術語	荒川清秀 49
從“黑茶”到“紅茶”——《六合叢談》中所見之“紅茶”	內田慶市 73
譯詞“化學”的誕生——從《六合叢談》看近代中日詞彙交流	沈國威 95
在自然神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六合叢談》的科學傳道	八耳俊文 117
《六合叢談》所介紹的西方科學知識及其在清末的影響	王揚宗 139
《六合叢談》的編纂及其詞彙	周振鶴 159

資料編

19世紀漢譯西洋書及和刻本藏書地目錄	八耳俊文 編 181
墨海書館出版書目一覽(1844—1860)	熊月之 編 242
《六合叢談》總詞彙索引	沈國威 編 249
上海地圖(1851·1853)	511

《六合叢談》影印

《六合叢談》第1號—15號	519
後記	編者 781

解 題

——作為近代東西(歐、中、日)文化交流史 研究史料的《六合叢談》

序章 緒言	
0—1 研究之概要	3
0—2 本文之目的	5
第一章 《六合叢談》出版背景	
1—1 19世紀前半葉的中文期刊	5
1—2 墨海書館	6
1—2—1 創立	7
1—2—2 作為出版機構的墨海書館	9
1—2—3 墨海書館的財政概況	12
1—2—4 墨海書館的運作與管理	13
1—2—5 墨海書館的終結	15
第二章 關於《六合叢談》	
2—1 《六合叢談》的版本	16
2—2 刊載文章篇目一覽	18
2—3 主要文章	25
2—3—1 《真道實證》	25
2—3—2 《西國天學源流》	26
2—3—3 《西學說》	26
2—3—4 《華英通商事略》	27
2—3—5 《重學淺說》	27
2—3—6 《用強說》與《反用強說》	28
2—4 《六合叢談》的編者、撰寫者及合作者	29
2—4—1 偉烈亞力	29

研究編

2—4—2 王韜	30
2—4—3 慕維廉	31
2—4—4 艾約瑟	31
2—4—5 韋廉臣	32
2—4—6 其他	32
2—5 《六合叢談》的停刊	32
第三章 《六合叢談》傳入日本及和刻本	36
3—1 《六合叢談》的傳入日本及現在的館藏情況	36
3—2 關於和刻本：版本情況及刊行時間	37
第四章 《六合叢談》的研究史	40
4—1 《六合叢談》之影響：中國和日本	40
4—2 中國的《六合叢談》研究	40
4—3 日本的《六合叢談》研究	41
4—3—1 日本語言學研究以外的情況	41
4—3—2 日本語言學研究的情況	41
終章 結語	42

序章 緒 言

0—1 研究之概要

19 世紀中葉在中國上海出版的《六合叢談》，是一份由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的上海印刷所——墨海書館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 刊行的月刊雜誌。該刊由倫敦傳道會的傳教士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任主編，從咸豐七年正月至次年五月 (1857 年 1 月—1858 年 6 月)，共出版了十五期。《六合叢談》的報道內容包括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宗教、各國近況等，向亞洲的讀者介紹了 19 世紀西方各國及其近代文明的詳細情況，是一份廣為人知、影響較大的雜誌。

《六合叢談》出版後馬上傳入日本 (見後文)。在日本，由幕府的西學研究教育機構——蕃書調所對雜誌的內容做了部分刪節後刊行了翻刻本 (被稱為官版刪定本)。《六合叢談》作為傳遞世界消息的讀物在日本獲得了廣大的讀者，對幕府末期、明治初期 (1860—1880) 的知識分子羣體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現在日本全國有 20 家以上的圖書館收藏有《六合叢談》的官版刪定本，這一事實也恰如其分地說明了其流佈範圍之廣^①。不僅如此，《六合叢談》還向日本引介了定期刊物這一出版形式，與《遐邇貫珍》(1853—1856)、《中外新報》(1854—1861) 等一起被稱為“日本報刊之嚆矢”^②，在日本近代報刊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六合叢談》不僅在瞭解亞洲近代的歷史進程方面是重要的資料，而且對於廓清 19 世紀西方文明的東傳與容受，以及其所給予東方的影響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此外，包括化學、數學、力學、天文學等諸學科的大量術語在內的漢字新詞^③，也首先被用於《六合叢談》，或通過該雜誌傳入日本。因此，有關《六合叢談》的研究，也必將對中日近代詞彙交流史，乃至日語的近代詞彙研究產生積極的影響。

但是，迄今為止以《六合叢談》為對象或資料的研究，還不能說已經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原版的《六合叢談》業已成爲珍本，一般的學者很難直接閱覽。特別是最後的兩期 (第 2 卷第 1、2 號)，迄今為止一直被認爲下落不明，學者們只能通過日本的官版刪定本來窺探最後兩期的大致內容。在不能通覽全部雜誌的情況下進行的研究，自然有其局限性。第二，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交流不夠充分。關於亞洲近代的研究，例如近代史、思想史、科學史、文化交流史等各方面的研究 (這裏姑且稱之爲近代學術史)，與包括對文本的解讀和對時代關鍵詞

語的考察等語言學史的研究，各自獨立進行，彼此毫無關聯，跨學科的研究體制尚未建立。衆所周知，東方接受西方近代文明是通過漢字這一載體來實現的，新詞、譯詞、學術用詞的創製往往同西方文明容受史有直接的關係。因此，跨學科的視角在近代學術史和語言史的研究上是必不可少的。

迄今為止，荒川清秀、內田慶市、沈國威等學者對近代漢字新詞、譯詞的形成，以及與之相關的中日兩種語言之間的詞彙交流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另一方面，八耳俊文以及中國的王揚宗、熊月之、周振鶴等學者則從科學史、東西方近代文明交流史的角度同樣選取了這一課題。我們通過國際研討會上的討論，或者通過交換論文、發電子郵件等手段探討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同時也深感現有方法論上的局限性，一致認為必須跨越學科分類來對這一課題進行共同的研究。幸運的是，20世紀90年代初，八耳俊文、熊月之分別在日本和英國發現了以前未見的最後兩期《六合叢談》^④。這樣，給近代學術史和近代語言史帶來巨大影響的《六合叢談》，就成了極好的研究素材。更幸運的是，財團法人豐田財團接受了我們的研究資助申請，從而使這一研究計劃得以具體實施。

在制定共同研究計劃時，我們打算從西學東漸和近代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學術用語的交流與接受的角度，對《六合叢談》及其所使用的詞彙進行全面的考察。以下是研究計劃的詳細內容。

1. 首先，在對英國圖書館(BL)、宮城縣圖書館、長崎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的《六合叢談》原刊本進行調查的基礎上，獲得複製本，按照與原本相近的形態進行復原整理。
2. 將經過復原整理的《六合叢談》全文輸入電腦，製成電子文本。
3. 對原本與和刻本進行互勘，將不同之處列成一覽表，以備今後的研究^⑤。
4. 對電子化的全文數據進行以詞為單位的分割，然後利用詞彙調查程序進行詞彙統計。
5. 在詞彙調查的基礎上製成總詞彙索引、語詞使用頻率一覽表。
6. 根據總詞彙索引，選取中日兩語言中共同使用的同形詞。大量存在的同形詞，可以認為是近代日中詞彙交流的結果。因此，同形詞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標數據。
7. 對一覽表中的同形詞，聯繫兩種語言中近代詞彙的發生、交流進行分析考

察。這裏主要注意兩個方面：一、語言學方面：即哪些詞，經過怎樣的途徑，何時傳到日本並融入日語；二、科學史方面：即某些詞彙所表達的近代科學知識傳入東方並被容受的歷史及其背景。我們力求使兩方面的研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8. 最後，將各自的研究成果寫成論文，與《六合叢談》的全文影印本及總詞彙索引、使用頻率一覽表等一起以論文集的形式發表。

承蒙英國圖書館、宮城縣圖書館、長崎大學附屬圖書館以及其他許多機構與個人熱情、無私的幫助，也由於課題組成員的共同努力，本研究得以圓滿結束。本書乃是集體研究報告的一個彙輯。

0—2 本文之目的

作為解題，原來只需對《六合叢談》的版本等情況加以說明即可，但是，為了給今後關於《六合叢談》，或者以《六合叢談》為史料進行的近代學術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有用的新資料，本文內容不僅僅局限於文獻學上的描述，同時也努力向讀者提供目前所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本文的內容由兩部分組成：其一是迄今為止的研究史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其二是本共同研究計劃所獲得的新成果。本文主要是根據熊月之、八耳俊文的有關論述以及課題組成員熊月之、周振鶴所提供的長篇研究報告為基礎寫成的^⑥。本文由沈國威執筆起草，並在課題組成員間輪流審讀，反覆進行了補充修改。此外，在本稿的寫作過程中，承蒙從事墨海書館及偉烈亞力研究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葉斌先生，惠示其有關墨海書館的《墨海書館的運營與凋落》的未刊稿，並允許我們將其最新的研究成果收入本文的 §1—2。在此特向葉斌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第一章 《六合叢談》出版背景

1—1 19 世紀前半葉的中文期刊

1807 年 9 月 7 日，基督教新教的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在廣州登上了中國的土地，東西方文化的接觸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然而，馬禮遜的傳教活動遇到了極大的困難。清政府實行了嚴厲的禁教政策，不允許公開地宣

傳基督教。不僅如此，中國社會還有將外國人視為蠻夷的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活動上受到嚴格限制，不得不通過書籍進行傳教的傳教士們，除了傳教小冊子以外，還積極出版了一些介紹西方科學知識的啓蒙讀物，以便在打破中國人迷信思想的同時，向中國人宣傳，西方人非但不是野蠻人，甚至還擁有並不亞於中國人的文明^⑦。馬禮遜向倫敦傳道會總部提出的十項活動方針的重點，便是在馬六甲設置傳教基地，開設印刷所，以此大力推進書籍傳教活動的開展^⑧。這表明出版中文讀物，以期達到傳道的目的，是倫敦傳道會的既定方針。馬禮遜的助手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在自己的著作中這樣寫道^⑨：

有必要在馬六甲每月或盡可能定期地發行類似於雜誌的中文出版物，以便將一般知識的普及與傳教結合起來。

在這樣的方針指導下，從1815年在馬六甲創刊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21年停刊)開始，倫敦會傳教士們先後創辦了《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巴達維亞[今雅加達] 1823—1826)、《天下新聞》(馬六甲 1828—1829)、《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廣州、新加坡 1833—1835, 1837—1838)、《各國消息》(廣州 1838—?)和《遐邇貫珍》(香港 1853—1856)等刊物^⑩。1860年以前由傳教士出版的中文期刊，除了寧波的《中外新報》^⑪(1854—1861)以外，全部由倫敦傳道會主持。如果把上述雜誌說成是由倫敦傳道會的傳教士帶入中國的新的出版形式的話也不為過。這些雜誌在出版過程中慢慢地注意增加世俗的內容。而此時，中國的傳教中心已開始從廣州經寧波逐漸移向上海了。

1—2 墨海書館

中國打開國門之前，倫敦傳道會已經擁有馬六甲、新加坡及巴達維亞三處印刷所。這些印刷所刊行的傳教書籍對中國本土乃至整個亞洲的影響並不很大。但是，1843年從巴達維亞遷移到上海，被命名為“墨海書館”的印刷所，一直到《北京條約》簽訂的1860年，卻成了中國西學東漸的重要基地，在中國的印刷史上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同時，墨海書館還因作為對外部世界具有極大興趣的一部分中國士子的活動場所而知名。因此，若要瞭解19世紀中葉中國教會的出版、印刷事業以及西方各種近代新知識傳入中國的具體情況，就必

須從墨海書館說起。

1—2—1 創立^①

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是倫敦傳道會在上海的出版機構,由該傳道會的傳教士負責管理。倫敦傳道會是已知的最先向中國派遣傳教士的英國新教團體,1795年成立的該會,1807年即派遣馬禮遜前往中國。

墨海書館由倫敦傳道會的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創立。根據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上海、寧波等五個城市被指定為對外通商口岸。倫敦傳道會因此決定將對中國的傳教基地由南洋移往通商口岸。1843年8、9月間,該會的傳教士麥都思、小米憐(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1863,即William Milne之子美魏茶)、維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等在香港開會,選擇上海、寧波作為新的傳教基地。會後,麥都思北上,在舟山與維魏林會合,並最終於1843年12月中旬到達上海。他在上海一直生活了十三年,直到1856年返回英國。

麥都思於1796年出生於倫敦。十四歲時,向從事印刷行業的人學習印刷技術,從此與印刷行業結下了不解之緣。其後,麥都思成了倫敦自立教會的會員。恰逢此時,倫敦傳道會要為負責管理設置在馬六甲的印刷所的米憐牧師招募助手,麥都思提出願意接受這份工作。麥都思的申請很快被批准,他被派到哈克尼學院,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學習有關印刷、出版的知識。麥都思學習結束後,於1816年9月從英國乘船東來,1817年2月10日到達印度的馬德里。麥都思在那兒停留了數月,其間與馬丁小姐結婚。6月12日麥都思偕妻子來到馬六甲,作為米憐的助手從事印刷所的管理工作。他非常熱心學習漢語及印刷技術,同時又因積極地投入宗教活動而獲得好評,遂於1819年4月27日被任命為牧師。其後,麥都思於1821年前往巴達維亞設立印刷所,開展傳教活動。1822年米憐去世後,他成為倫敦傳道會在南洋的傳教活動的總負責人。

鴉片戰爭後,在南洋從事了二十多年傳教活動的麥都思來到了中國。他是來華傳教士中名聲最大、著述最多的一位,他用漢語、英語及馬來語撰寫的各種著述總數超過九十種。包括數種英漢辭典在內,他前後出版了《耶穌贖罪之論》、《福音調和》、《養心神詩》等傳教小冊子,《特選撮要每月紀傳》、《遐邇貫珍》等綜合雜誌,以及《地理便童略傳》、《東西史記和合》等啟蒙讀物。此外,麥都思對聖經的翻譯事業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麥都思歸國後不久,即翌年1857年1月24日病死於倫敦。他去世的消息傳來,墨海書

館的同仁們非常悲痛，例如偉烈亞力在《六合叢談》(第1卷第4號)中登載了一篇名為《麥都思行略》的長篇悼念文章，介紹了麥都思的生平，高度稱讚了他在傳播福音方面的功績。王韜也在給友人應雨耕的書信中，寫出了自己失去異國知己的悲痛^⑬：

敝居停麥牧師於丙辰八月中旬返國，冬盡得抵倫敦。至僅三日，溘然而逝。聞信駭悼，潸然出涕。此瀚海外一知己也，悲真刻骨，痛欲剗心。精契所在，存沒無間，人琴之感，幽顯迥殊。

麥都思去世後，其子小麥都思(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1885)就任英國駐上海領事。同時，為了表彰麥都思的功績，倫敦傳道會於1904年在上海成立麥倫書院(Medhurst College)^⑭。

墨海書館最初設立於上海縣城東門外的麥都思的住處。在麥都思來上海之前，1843年11月8日，英國首任上海領事巴富爾(George Balfour)在翻譯、助手、醫生的陪同下來到上海，擔任翻譯工作的即是小麥都思(麥華陀)。巴富爾與上海道台(行政長官)官慕久協商決定，上海於11月17日正式開港成為對外通商口岸。12月23日，麥都思在上海縣城東門外賃屋住下。一年的房租是250圓^⑮。麥都思住在二樓，一樓放着從巴達維亞運來的印刷機器。印刷所起名為“墨海書館”。中國有“墨海金壺”的說法，“墨海”有大硯、墨盆的意思，正適合作為出版機構的名字。同時，“墨海”也與麥都思的名字的發音相近，“Medhurst”用上海方言發音的話，確實很像“墨海”。

東門外的那處房子，結構和地點都不好，並不適合居住。因此，1845年12月底麥都思向北門外的徐彩章租借宅地^⑯。面積為13.31畝(1畝即666.7平方米)。根據《英冊道契》第21號，借用的是第61號地，東邊是道路，西邊與第63號地相連，南邊是興安義塚，北邊與胡姓人家的土地相連。押租金(保證金)每畝70000文，合計912170文。因是“長期薄租”，每年每畝的租金為1500文，合計19546文。契約簽訂之初還沒有契約書，先交換了字據，後來才製成了正式的契約書(道契)。道契中有“係英國倫敦京都傳道會託擇英國人麥都思租定代為經理”的字樣。雒魏林則租借了相鄰的62號地，不過到1850年7月23日的時候，他將62號地的一部分(約5.5畝)轉租給了麥都思。倫敦傳道會合計租借了18.81畝的土地。麥都思租下這塊地以後，這一帶遂被稱為“麥家圈”。

對於麥都思租借這一塊土地，上海的道台開始有一些猶豫。原因是這塊土地的位置遠

離當時其他的外國租界，而靠近中國居民。但最終在附加了條件之後獲得了同意。條件是建造的房屋必須是中國式的¹⁸。但這一條件並沒有得到遵守。麥都思在這塊土地上建築了住宅五處，醫院一處，印刷所一處，即墨海書館。房屋東西方向一字排開，都是歐式建築。除了醫院以外其他房屋全部是二層樓。大門朝南，有磚砌的長廊。根據記載，墨海書館是長63英尺，寬22英尺（長19.2米寬6.7米）的一座二層樓建築¹⁹。1846年8月，傳教士們搬入了新居。這裏原來是農田，周圍沒有人家，很空曠，空氣也非常好。步行五分鐘能走到附近的村莊，步行十分鐘便可以到縣城的繁華街區了。

《六合叢談》的封面上蓋有“江蘇松江上海墨海書館印”，這是因為當時上海縣屬於江蘇省松江府的緣故。《六合叢談》出版的19世紀50年代，上海的縣城與英、美、法三個租界相鄰，墨海書館一帶正處於英法租界的中心。東面是外灘，西面是泥城浜，南面是縣城，北面是蘇州河。租界地是根據1845年公佈的《上海土地章程》而設立的（參照本書所附的地圖）。

當時租界地規定，除了一部分僱工以外，是禁止中國人居入租界的。但是1853年9月，小刀會發動反清起義，縣城被佔領。縣城和城東的繁華街區成了小刀會和清軍戰鬥的戰場，許多居民逃入了英租界。租界從“華洋分居”變成了事實上的“華洋雜住”。1854年英國租界地的土地章程修訂之後，追認了這一事實。之後，租界的人口飛速增長，從1853年的五百人猛增到1855年的兩萬人。1855年小刀會雖已被鎮壓，但租界的人口依然持續增加。其原因是很多難民為了躲避長江下游太平天國與清軍的戰鬥而逃往上海，並進入了英租界。租界飛速發展，聚集了各種各樣的人²⁰。

1—2—2 作為出版機構的墨海書館²¹

墨海書館是在中國本土創立的第一家近代印刷所²²。麥都思從巴達維亞帶來的主要是一臺手動印刷機以及若干金屬活字。活字只有在馬六甲英華書院工作的宣教士戴爾（Samuel Dyer）所製的半套。還有少量從郭實臘處獲得的柏林製作的大字體活字，不過質量遠不如戴爾的活字好。即使這兩種活字合在一起，字數也不夠使用，因此常常不得不根據手頭的活字對文章的遣詞造句進行修改。為了彌補活字的不足，麥都思請上海的工人雕刻了一千五百種共六千個字，每個字的雕刻費是0.5便士。雖然工人刻的字質量很好，但畢竟不同於鑄造，活字之間總有些微妙的不同之處。麥都思向倫敦傳道會的理事會要求提供兩副戴爾設計的活字，並提出了一個節約經費與時間的方法，即選出使用頻率高的一千字，製備好鑄模，必要的時候進行鑄造，而其他漢字則根據實際需要要在上海雕刻。

最初的印刷工人是麥都思從巴達維亞帶來的一位名叫裘天生的青年²²。經過這樣一番準備之後，墨海書館從1844年4月開始印刷。

麥都思和雒魏林還在寫給倫敦傳道會總部的信(1845年12月27日)中，要求引入新型的印刷機²³：

《聖經》的印刷，從現在起大部分要移到上海來進行了。現在正使用的印刷機為印刷傳教用的小冊子所佔，實在有必要購置一臺新的印刷機。懇請理事會能用最早的一班從利物浦到上海的直航輪船，運來一臺最好的滾筒式印刷機，也就是庫珀或納波爾的雙滾筒式印刷機。

1846年4月10日麥都思等又再次寫信要求新的金屬活字²⁴：

我們需要中文小字體的活字。也就是您在1844年4月4日的信中所看到的，瓦茲(Watts)現正在製作的活字。那種活字，除了個別字以外，筆畫清晰，字體優美並且很勻稱。我們覺得其大小非常適於《聖經》的印刷，並且與現在在上海正在使用的活字也很匹配。上海製成的活字是倫敦傳道會的財產，現正用於《英華辭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以及《中國古籍》(Historical Classic of Ancient China)的印刷。這需要有三萬以上的漢字及三千個異體字，除了常用漢字以外，還要包括一般不用或已經不再使用的漢字。

1847年秋天，先前要求的滾筒式印刷機運抵上海，當年年底開始印刷。1847年8月便已來到上海的印刷技師(墨海書館監理)偉烈亞力，於1848年6月4日給倫敦傳道會總部送去如下的報告²⁵：

我很高興地報告，那臺印刷機已經正常工作了六個月了。但是它工作的速度太快，使得裝訂等其他成本費用上昇。我們現在的資金狀況已無法維持這樣的速度。當然，到印刷新翻譯的《聖經》的時候情況將會完全不同。現在印刷的內容用手動的印刷機正好。

那麼，滾筒式印刷機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呢？據麥都思說一天能印五千份。一份相當於